

陆路港口：清代张家口“港口”功能与草原腹地市场的构建

肖红松 刘建哲

【摘要】有清一代，张家口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商贸城市。从陆路“港口”形成的区位条件、城市的港口功能和草原腹地市场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可知，当时之张家口居于内地与草原市场的转口贸易中心地位，并与蒙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的草原腹地市场，是具有“港口—腹地”模式特征的陆路港口型城市，并切实凸显了清代华北地区陆路型港口城市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清代；张家口；陆路港口；腹地市场

【作者简介】肖红松(1971—)，男，河北安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刘建哲(1986—)，男，河北清苑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保定 071002)。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21.3.74～83

陆路港口，简称“陆港”，也称“无水港”“干港”“旱码头”，主要是在内陆具有港口服务功能的物流中心，同时也是内陆地区进出货物的陆路物流中转基地^{[1][P115]}。与海港不同，陆港特别是传统陆港受地理环境、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其在形成条件、港口功能及腹地经济有着独特的一面。张家口是清代长城沿线因商贸兴起的典型陆路枢纽城市。草原贸易兴起后，张家口的“港口”功能开始凸显，发展成为连接内地与草原市场的中转贸易枢纽，被称为旱码头或陆路商埠。目前，学术界对清代张家口的研究主要是从商业、商人、商品贸易、城市近代化等方面论述^①，从陆路港口的视角审视张家口的城市功能及其市场体系的还较为缺乏。而从区域历史经济地理角度对港口型城市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港口—腹地”模式，学术界也主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紧密结合，研究区域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近代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典型口岸贸易城市^②，极少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传统陆路港口城市。本文拟借鉴“港口—腹地”解释框架，从张家口“港口”形成的原因、条件、功能及其与腹地市场

的内在关系等多方面探析陆路型港口城市与腹地间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此明晰清代张家口商贸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在内陆城市中的区域典型特征。

一、张家口“港口”形成的区位条件

张家口，又称“张垣”“武城”，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是冀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历史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带、民族交错带、地貌过渡带的交界地区，也处于北方沿海向内地辐射的过渡地带，具有起承东部沿海连接西北内陆，南联内地北进边疆的重要区位，地缘优势明显。清代，张家口正是在此种特殊地理环境下，逐步具备了“港口”形成的区位条件。

(一)在地理位置方面，张家口是内地出入蒙古草原的重要门户

张家口所处的长城沿线地区，位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两大地理单元的过渡地带。地势由西北到东南地势分级下降，“自蒙古高原以至沿海平原级级下降，张家口为一级，居庸关为一级，至北京则惟见平原”^[2]。该地区地形复杂，山川、河谷、盆地相间分布，阴山山脉从张家口北部穿过，形成高坝以限蒙古草

原,构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因而,坝上草原与山地交界的山口谷道如张家口、独石口,成为进入蒙古草原的天然孔道。张家口三面环山,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北面为清水河入塞的山口,也是蒙古高原进入山地的隘口。清乾隆《口北三厅志》记载:“二山皆在边口,相去数百步。对峙如门,张家口之名以此。”^{[3](P46)}

此外,张家口地区作为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军事斗争的前沿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清以前北方游牧民族攻取幽燕必经张家口地区;自辽以后凡是定鼎燕京者必须以张家口地区为屏障^{[4](P167)}。张家口最初的城市雏形是明代宣府镇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下级军堡——张家口堡,为宣府镇长城沿线的重要隘口,在战略上处于极冲位置,“两山对峙,石壁崎嶇如削,中设一关,环山为城”^{[5](P7)}。明中后期“隆庆和议”后,张家口堡被开辟为马市,成为长城沿线重要的民族贸易互市之所。“本堡(张家口堡)乃全镇(宣府镇)互市之所,堡离边稍远,恐互市不便,乃砖垣于其口……堡人习与虏市,远商辐辏其间。”^{[6](P42)}在清代以前,张家口已成为民族政权间军事斗争、贸易往来的重要据点。

清初,清廷实现对蒙古草原的统一之后,张家口的地理区位从边疆转变为内陆。清廷在张家口长城边墙下开设大、小境门,成为进出蒙古草原的重要关口。“(长城)关门为数至多,惟东端之山海关,西端嘉峪关,直隶之张家口为最重要。”^{[7](P28)}

为了笼络和管理蒙古各部,清廷规定内地商人可以通过领取部票形式前往蒙古各地进行贸易,张家口成为内地商人前往蒙地的贸易孔道。“东曰大境门,西曰小境门,系内外出入要隘。设立满洲总管一员统辖八旗官兵驻防看守,稽查盗贼。其夷汉商民往来贸易耕种俱由驻防旗员照验部票……”^{[8](P2812)}清中后期,张家口也是天津与蒙古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隘口。“天津至蒙古有三道隘口,曰张家口,曰独石口,最后者曰古北口。其第一口最易通过,第二口极难穿行,而第三口尤为宽阔。且风景甚为迷人。”^{[9](P6)}可见,张家口虽无舟楫之便,却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陆路商贸路线的交通要口,成为“通蒙古之门户,其地势之重要比山海关尤有过之”^{[10](P35)}。如果将长城比作海岸线的话,张家口就是连接内地与蒙古草原的陆上口岸,具

有与沿海港口一样的区位优势。其中,蒙古草原市场与张家口发展最为密切,为陆向腹地范畴。

(二)在交通方面,张家口是草原贸易的转运枢纽和陆路交通中心

港口作为货物运输枢纽,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和货物的集散处,海、陆两种不同运输方式需要在这里进行换乘。张家口作为陆路交通运输方式的转换点,是“南北货运的转运终点,驮兽和其他运输工具,均在此易载”^{[11](P1292)}。这也是其陆港形成条件的重要因素。早在清前期,清廷西北用兵平定蒙古准噶尔部期间,张家口就为西北军事物资转运点。“大兵讨逆,行资居送,不特刍粟为然。凡甲冑、器械,一切军需什物,俱由工部制造,委员押送至口,转雇驼脚,运至军营。每年运费约数十万。”^{[3](P295)}旅蒙贸易兴起后,随着商贸范围的扩大,张家口发展成为口内外商品集散地和转运枢纽。“山西、陕甘、内外蒙古、俄国边境与其内地之产物,无不集于此地,而后转运各处。”^[12]清末,京张铁路开通后,张家口的转运优势更加凸显。“我国西北一带,物产富饶。前以铁路未通,转运维艰。自京绥路通行以来,横亘燕晋,察绥得地利之胜。于是西北物产,远至蒙古库伦、乌里雅苏台以及甘肃、宁夏等处,莫不蜂涌而来。”^[13]

就港口与腹地内部的货物运输而言,运输网络是构建港口腹地贸易发展的基础,对港口的兴衰、经济腹地范围的大小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如水路和铁路运输网络是近代沿海港口发展的关键因素^[14]。清代张家口前往草原贸易的交通工具以牛车、骆驼等传统畜力运输为主。因此,张家口与蒙古草原腹地的交通体系主要由传统的陆路运输网络构成。那么,是否可以从陆路港口的视角审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陆路商贸网络呢?关于港口与腹地运输网络构建,吴松弟指出,近代港口通往腹地的重要交通线,多以港口城市为起迄点,或与通往港口城市的道路相联接^[14]。清前期,内地通往蒙古草原腹地的商路多以张家口为重要节点^{[15](P218-222)}。其中,北路可通过库伦到达漠北蒙古;西北路经归化可至漠西蒙古;东北路过多伦诺尔到达蒙古东部地区。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互市条约》,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边境口岸。张家口经库伦至恰克图商路成

为中俄国际贸易通道,即著名的张库大道。天津开埠后,张家口也发展成为天津与西北贸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自张家口以上,道路分为三派。一通内外蒙古,一通京津,一陕甘北境。货之集散于此地者,不知凡几。”^[12]清末,以张家口为核心节点,已形成连接内外蒙古以及甘肃、宁夏、陕西及新疆各地商路网。“张家口东北通多伦、经棚,以达中蒙各部;西北通库伦、恰克图以及阿尔泰等口;西通归绥、包头、西蒙、伊乌两蒙以及甘、新等省,实为贸易繁盛之区。”^{[16](P75)}

由以上可以看出,以张家口为核心节点的商路将西北各地区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密集贸易网络。如果将这个交通网络比作大树的话,张家口—北京—天津一线就是它的主干。从张家口分出的支线不断向草原腹地延伸。可以说,张家口是西北地区与北京、天津等地之间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和交通中心。正是基于草原运输网络的形成。从而将原本封闭的蒙古草原市场逐渐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中,张家口也成为草原运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

(三)在经济腹地方面,张家口拥有广大的草原腹地市场

与沿海港口不同,陆路港口与其腹地都位于内

陆,这就决定陆路港口贸易与腹地经济的流通有其特殊性。就张家口而言,草原腹地市场是其输出货物的来源地和输入货物的消费地。由于缺少清代货物经由张家口进出草原腹地范围、流通数量等有关数据记载,难以按吴松弟所提出的以港口的直接货物来源或消费区域确定腹地^[17]。不过,在贸易关系上,贸易依存度是港口与腹地重要的参考标准。因此,张家口腹地范围可根据本地旅蒙商活动的空间来判定。这主要缘于草原贸易的特殊性。清代,由内地输入货物或由草原输出货物均需要旅蒙商以“出拨子”的形式完成。张家口由于处于出入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上,旅蒙商汇集。因而成为旅蒙商在蒙地交易中占支配贸易的根据地。以旅蒙业为主的商店在清康熙末年有80余家,雍正年间有90多家,乾隆年间有190多家,嘉庆年间有230多家,道光年间有260多家,光绪时期已达530多家^[18]。旅蒙商扮演的其实是一个特殊中间商的角色,专做内陆市场与草原市场之间的转口贸易。这样,草原腹地市场对旅蒙商所在的张家口形成一种相互依附关系。因此,根据张家口旅蒙商的活动范围可窥探其草原腹地市场概况。兹将张家口旅蒙商主要活动范围列表1。

表1 清代张家口旅蒙商主要活动范围简况表

时间	商号数	平均资本额	贸易额(年)	主要活动范围
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	30店到80店	制钱500吊	43.1万吊	八旗牧场、东西苏尼特旗、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扎萨克图汗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多伦诺尔
雍正元年至十三年	90余店	制钱500吊	59.1万吊	八旗牧场、东西苏尼特旗、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扎萨克图汗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多伦诺尔
乾隆元年至六十年	190余店	制钱600余吊	110.7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
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	230余店	制钱600余吊	136.3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
道光元年至三十年	260余店	制钱700余吊	166.6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
咸丰元年至十年	290余店	制钱800余吊	290.6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一带
同治元年至十三年	390余店	制钱850余吊	266.6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
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	400余店	制钱900吊	551.4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
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	530余店	纹银800两	484.4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
宣统元年至三年	570余店	纹银900两	757.7万吊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青海

资料来源:伪满兴安局调查科编《张家口ニ於ケル旅蒙貿易》,1939年,第5-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清代张家口旅蒙商早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蒙古地区,后扩展到新疆的伊犁、古城等地,清中后期再伸展到东北的海拉尔、满洲里及西北的青海。可见,张家口的商贸辐射范围之广。

二、张家口城市“港口”功能

港口型城市多以贸易功能为主,除具有运输功能外,在城市中还会形成货物交易的中转市场及为贸易服务装卸、加工、运输、交易等服务功能,并在商品流通、金融汇兑、资本和产业结构上与腹地之间有稳定经济联系^[19]。清代草原贸易兴起后,张家口在市场、交通运输、金融等方面凸显港口型城市功能。

(一)内地与草原货物的中转交易市场

港口以运输功能为主,但其能带动所在城市商贸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货物能在本地市场上进行交易,并形成与货物交易相关的商业、运输业、仓储业、金融业等行业。清代旅蒙贸易兴起后,来自内地和蒙地的货物在张家口形成中转批发贸易市场。清乾隆末年《闻见瓣香录》记载:“(张家口)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20](P215)}商品货物一般由商人从内地汇集到张家口批发转卖给旅蒙商,旅蒙商以出拨子等形式将货物运往蒙古各地。从内地出口到俄国的货物也多在张家口市场交易。“茶叶、丝绸和所有其他用于批发给俄国贸易的中国商品,首先在长城内的一个大型边疆城市张家口收集,他们经常在那里换手。最后,他们会安排将茶叶、丝绸和所有其他中国商品运抵恰克图。”^[21]清前中期,经由张家口输出到蒙地和俄国的商品主要以茶叶、布匹、绸缎及杂货为大宗,从俄国、蒙地经张家口输入到内地商品则以牲畜、皮毛为主。北京、山西、汉口、苏州和杭州是与草原贸易的主要内地市场^[22]。汉口是南方的茶叶集散中心,“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国者,皆砖茶也”^{[23](P110)}。杂货、布匹和绸缎主要由商人从南方的苏州、杭州等内地市场购入,经京杭大运河或海路到达天津、北京,再用骆驼、牛车等运送到张家口售卖给旅蒙商,再转运至蒙地和俄国。而产自蒙古各地的牛、马、羊、皮张及俄国皮毛复向通过张家口运到上述各地。其中,蒙古牛、羊主要在北京和华北销售,也有少量运到湖南

和湖北。皮毛在山西、北京等地进行加工后,再转销到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甚至江南等地^[24]。这样,以牲畜、皮毛、茶叶、绸缎、杂货为主的大宗商品构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市场的中转交易市场。

近代天津港口的崛起,促进了天津与西北地区贸易的发展。来自西北地区的皮毛等货物便在张家口市场集结后再运至天津。“(张家口)其进口货,则以牲畜皮毛为大宗,黄油酪酥次之,羊毛与驼毛数额尤巨,皆道天津而转输外洋者。”^{[25](P37)}而“由天津输入于张家口则以茶为大宗,诸商货亦甚伙。以张家口占着贸易之中心,蒙古一带及黄河之上流暨甘肃全部皆仰其供给”^{[26](P8-9)}。

(二)草原贸易的转运中心

港口城市作为运输枢纽,运输、中转功能是城市功能的重要体现。张家口作为南北货物汇集地,转运运输业十分发达。“所谓骆驼商队者,以张家口为中心,南至丰台,北至喇嘛庙、库伦、归化城,远或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一带之穷边。”^{[27](P4)}清中后期,仅运茶一项,由天津经张家口运往恰克图,每年运费约用银100万两^{[9](P173)}。每年由张家口运往库伦的货物,据规划张库铁路时估算,需用骆驼为5万峰^{[9](P140)}。据波兹德涅耶夫考察,清末俄商在张家口转运行连同堆栈开销,每家要支出1-1.2万两银子^{[28](723)}。“张家口商人自述其贸易情形:每当极盛时,凡骆驼通过其地者有一万余头,由张家口当地之所发行,亦日有骆驼一千余,马五百余,源源不绝,则其商务之发达,不亦想象可得矣乎。”^[29]

张家口与运输业相关的牲畜养殖业、服务业也十分兴盛。清乾隆年间,张家口有养牛户57家,多集中在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南天门、元宝山等郊区各村,最大的养牛户有牛千头^{[30](P16)}。清光绪年间,据波兹德涅耶夫考察,用牛运输的老信车在丰镇有2100辆左右,俄国每年至少有12000箱茶叶是由丰镇的老信车从张家口运到库伦的^{[31](P48)}。养驼户多在张家口下堡附近,有的大户一家就有骆驼400-500峰^{[32](P56)}。其中,有不少养驼户还发展成一批专业运输商号,著名的有天德公和宝顺栈等。

此外,还有大量蒙古人来张家口从事运输业务。“由中国本部输入张家口者,则以砖茶为大宗,其他烟草杂货亦不少。中国人以此地为茶叶贸易之中心,由此转运于恰克图、库伦及蒙古内地。以此之

故,蒙人大多来此运货以营生计。”^[33]

(三)形成了为“港口”贸易服务的相关行业

1. 仓储业。港口作为货物集结点,在城市中会形成中转运输、装卸仓储等物流服务功能。张家口商贸以批发贸易为主,有大宗货物在这里交易。需要设置仓库来储存货物。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科瓦列夫斯基经考察后论述说:“张家口是运至恰克图所有货品的出关之地,那里专门有一个宽敞的大院子,很多店铺和仓库都设在里边,用以储存俄国的货物以及要运往俄国的茶叶。”^{[34](P91)}当地一些较大的批发商铺如茶庄、皮毛庄,一般都是兼有仓储性质的“货栈”。“自乾嘉至道光年间,为晋商对俄贸易全盛时代。在东口及恰克图之货房,有一百零八家之多,其营业多以贩运红茶为主。”^[35]由于经张家口去往草原贸易的路途遥远,运输的驼帮常以库伦和张家口两地作为货物的临时储存地,以方便运输^{[36](P92)}。

2. 金融业。金融是为贸易服务的,大宗商品交易必然伴随着资本流通。有论者指出,清前中期张家口成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原因,正是草原贸易对资金需求量甚大,周转期长,催生了张家口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的产生^[37]。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在张家口设立,即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密切相关。“其票庄之创置为内地汇兑之肇始,晋人恃有此项金融组织为其后盾,其独占中俄贸易之牛耳,固无足异也。”^[38]仅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家口日升昌分号与内地13个城市进行通汇业务,汇兑往来金额达163364两^[37]。

账局是在张家口最早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清中叶,张家口开设的账局有十几家,其中著名的祥发永、大升玉的资本都达四五万两^{[39](P10)}。不过,笔者认为,账局的产生应与标期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民国《银行周报》对标期制度作如下论述:“查标期之发源,实由于对蒙俄之贸易。清时外蒙对俄贸易之中心在库伦,而张家口则为内地去库伦必经之关口,出关即为口外……其金融周转之时期需约一年,仰赖东口金融界为之调济。每年总结账一次,必须以镖车运现银交解,因有一年一次之标期。”^[40]而账局的借贷也多以一年为期。这说明,张家口与草原腹地之间形成了统一的金融结算体系。科瓦列夫斯基则进一步佐证说:“这里白银的汇率与

北京不同,却与恰克图、库伦相同,看起来张家口好像是这些地方的补充和延伸一样。”^{[34](P91)}

3. 加工业。张家口的“港口”贸易带动了当地加工业的发展。民国《万全县志》载:“在昔平绥路未通时,所有本口之工商业皆兢兢业业悉本旧规,以与蒙古各盟旗交易。出口货为烟、茶、油、酒、米、面、布匹、糖味、海味、铁器、瓷器等日常用品,入口货为皮毛、牲畜、盐碱、木料、蘑菇、奶食等。所有出口入口各货,如系原料或须改制者多有在本口制造成品及改装运发。”^{[41](P201)}特别是清后期,在皮毛贸易带动下,张家口成为主要的皮毛加工中心。1909年天津海关报告记载:“惟本省之张家口,晋省之交城县同为熟皮之中心点,山羊皮均熟于张家口,羔皮成熟于交城。山羊皮亦有自出产之区收集后运至张家口,拣选、剔净、缝之而成被褥,方可运津。其余运津之各项皮张,亦皆在内地缝之为袍、为褂,故营此缝工者已成一大事业,计每年工资约3000000两之谱。”^{[19](P281)}

4. 经纪。经纪系介绍买卖双方交易的中介商人。张家口的经纪也主要从事商贸服务业务。恰克图互市后,从北京和其他城市来张家口的批发商人会购入从恰克图运来的俄国商品,然后由经纪人或伙计之手,分运到各省或较大的集市^{[42](P221)}。天津开埠以后,不少外国洋行来张家口采购皮毛等货物,促使张家口产生了专为外商服务的买办经纪。如天津洋商从张家口购入羊毛,“并非直接购诸蒙古,乃先遣我国人做介绍,然后经行家之手而买入之”^{[43](P26)}。在张家口的俄国商人也是通过当地买办进行交易。“与其他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商人一样,俄国商人也是通过中国商务买办进行商品交易的。这些买办受自己同胞的委托,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44](P28)}

三、张家口草原腹地市场与市场等级

目前,关于张家口市场体系与等级划分的界定,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松弟根据克里斯泰勒的中心理论,将张家口置于天津腹地内区域中心市场地位,张家口下又分中级市场和农牧区的集市及庙会等为主的初级市场^{[45](P169-175)}。但这种划分是基于近代铁路等新式交通兴起后,天津与腹地内形成不同程度贸易关系而确定的且将张家口与太原、兰州等城市一样看作是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市场地位。而清代张

家口在天津开埠前后均发挥着连接内地市场与草原市场的中转贸易作用,其陆港的定位并未发生变化。实际上,张家口在天津与草原市场之间发挥着一种转口功能,其关系“犹若汉口之于上海”^{[126](P8)}。

从港口腹地市场结构角度出发评析张家口市场体系,可根据贸易依存度将张家口的腹地市场分为核心腹地区与边缘腹地区。如前文所述清代张家口的草原腹地市场范围虽极广,但与张家口形成直接贸易依存关系的主要是核心腹地区。有清一代,张家口与归化城是草原贸易的两大重要枢纽。张家口的核心贸易范围主要在蒙古草原中部以东,归化城则以草原西部和新疆为主^[46]。这也与张家口旅蒙商人在蒙古草原的集中活动范围相符合。《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对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记述道:“晋商经营西北商务,有蒙俄两部,而其总汇之处皆在东口西口。东口者,张家口也,北至库伦、恰克图等处。西口者,绥远城也,西北至包头、宁夏、新疆、伊犁、塔城、科布多、乌梁海及俄属各地。”^[35]民国时期,张库交通断绝和日本占领内蒙古东部后,蒙古核心腹地市场基本消失,张家口商贸因而走向衰落。“外蒙既入俄人的经济势力范围,内蒙又有于日人掌握之危险,则其损失,将绝不止张家口地位之衰落。”^{[47](P106)}

鉴于此,本文只对张家口核心腹地市场情况作论述。

就张家口的草原腹地市场等级划分而言,笔者认为,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市场,除具备一定的市场规

模外,还需要位于草原腹地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以发挥其重要的货物集散功能。为此,笔者将清代张家口腹地市场分为中心市场、集散市场和基层市场。中心市场为张家口,直接面向集散市场和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主要有库伦、恰克图、多伦诺尔。恰克图为中俄互市之所,是中俄货物集散地;库伦为漠北蒙古的政治、宗教、商业中心;多伦诺尔为蒙古东路宗教中心和商业重镇。基层市场则为较小的市镇、旗地、王府、寺院等。

(一)中心市场

张家口作为中心市场,是北方重要的陆路贸易中心。“(张家口)为中国内地与中国蒙古之关门。在东北则有多伦诺尔,在北部各省间则有山西归化及大同府,次则甘肃之兰州、甘州、凉州、宁夏府等,皆与张家口往来贸易。”^[26]

其贸易主体由三部分组成。“一华俄陆路之贸易,一洋商间接之贸易,又其一则中国与蒙古间之贸易。所谓华俄陆路贸易者,以中国之茶之丝之织物之杂货,销路最为广远。由内地输出经库伦运送恰克图。而俄商则输送兽皮织物及其他杂货,专使橐驼横断沙漠,而运来以至于张家口。此其商务之大者也。所谓洋商间接贸易者,诸外国商人以华商之名义开设商店于其地,每岁收买皮毛羽革之数甚伙以运至外洋。此其商务之次者也。所谓中国与蒙古间之贸易者,凡华商均得自由营业。”^[29]张家口也是俄国、内地、蒙地等地产品和天津进口物资的集散地。兹将清末张家口市场上主要商品情况列表2如下。

表 2

清末张家口市场主要商品情况表

种类	主要商品	销售地
皮类	海龙、银针、狐皮、水獭、海猫	出俄国销内地
	猢猻、灰鼠、珍珠毛、骨种羊、羔儿皮、山羊皮、山狸皮、起青皮、老羊皮、兔儿孙、猾子皮、獭儿皮、牛马皮	出蒙古销天津及内地
毛类	羊毛、驼毛、马尾子	出蒙古销外洋
牲畜类	牛、马、羊、驼等	出蒙古销本地及京都等地
绒货类	哈喇、回绒、哔兔、獬锦、獬布	出俄国销内地
食品、药材类	盐、奶酪、乳皮、黄油、奶豆腐、松葫芦、胡麻油、烧酒、黄酒	出蒙古销内地
	发菜、葡萄酒、杏仁、鸦片、水烟	出甘肃、新疆等地销京津等地
	黄芪、鹿茸	出恰克图销内地
布帛类	棉花、大布、梭布、棉线、葛布、夏布	出直隶、江南销本口、库伦、恰克图及蒙古各地
	洋布、洋哔叽、洋缎、羽缎、羽毛及各种洋货	由天津运销本口及蒙古
绸缎类	贡缎、宁绸、花缎、湖绉、纺绸、官缎、线绉、纱、罗、绒线、珠线、栏杆	出江南等地销本口及蒙古
杂货类	纸、瓷器、海味、干菜、糖、藤、竹	出江南等地销蒙古
茶叶	红梅茶、砖茶、篓子茶、细末砖茶、香片茶	出湖广销俄国、蒙古

资料来源:李廷玉《游蒙日记》,民国4年(1915年)铅印本,第33-36页。

张家口中心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兴盛。民国元年(1912年),张家口人口已有13.2万人,商店数量1037家,年交易额达2248.1万两^{[48](P17)}。

(二)集散市场

1. 库伦

清代库伦为漠北蒙古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也是张家口旅蒙商人商业活动中心。至19世纪初,库伦“市分二区,汉蒙分处,货物充牣,人烟稠密,口三万余”^{[49](P69)},成为整个漠北蒙古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经济腹地包括车臣汗及土谢图汗二盟,以及库苏古尔境内及三音诺颜汗东部^{[50](P17-18)}。

库伦是张库大道重要的商贸节点,也是张家口与恰克图之间重要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张库是内地与外蒙交易的重要商埠,外蒙输出的货物,大部分先集于库伦而由张家口入内地。内地输往外蒙的货物,亦先集于张家口而由库伦分销外蒙各地。”^[51]由张家口销往蒙地的茶叶也大部在库伦集散。“中俄未绝交前,由张家口运售库伦茶叶多则四十余万箱,少亦有三十万箱,获利甚巨。”^{[52](P2047)}张库间的皮毛贸易业很兴盛,有专门经营库伦贸易的库伦庄,“库伦庄皮张行每年贸易额合计在六百万两上下,业此者亦有二十余家”^[53]。羔儿皮、山羊皮、老羊皮等皮货,以库伦为总汇运至张家口销售内地及天津洋行^{[54](P33)}。张家口与库伦贸易关系最为紧密。“张垣为察省重镇,乃入库之咽喉,向为西北经济之枢纽,商业之重心。自逊清咸丰十年,与库伦同时辟为商埠后,与库伦之关系更为密切,车驼辐辏,商贾往来,实为张库通商之始。”^[55]后随着民国时期外蒙古宣布独立,张库交通断绝,以库伦为中心的外蒙腹地市场消失,张家口商贸也衰落下去。

2. 恰克图

恰克图,又称“买卖城”,清雍正五年(1727年)被定为中俄互市之所后,商贸逐渐兴盛。“至乾隆五十七年,又与定约五条,仍开互市场于恰克图。自是蒙古沿边贸易,均归此处。俄人之至京贸易者,亦取道于此。百货云集,为中俄于蒙古陆路贸易之中心点,居然一大都会。”^{[25](P31)}

张家口是中俄恰克图贸易货物的集结点和中转市场。早在清康熙年间,中国对俄贸易所需的茶、

布、粮米均由张家口运往^{[56](P92)}。中俄恰克图贸易以茶叶、皮毛等货物为大宗。“茶市以张家口为枢纽……自秋至于初春,最为繁盛,所至骆驼以千数,一驼负四箱运至恰克图。”^{[25](P37)}经恰克图进口的俄国商品也主要由商人贩运至张家口,“上堡也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几乎全部的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出口的全部毛皮制品都是先运到上堡的货栈,然后批发给下堡”^{[28](P704)}。《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商人可以进入内地自行采购茶叶等商品,经天津至恰克图商路的茶叶贸易日益兴盛,恰克图作为中俄商品集散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俄国对华的贸易则越来越依靠恰克图口岸和恰克图商道^{[57](P75)}。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开通后,中俄传统恰克图贸易路线发生改变,恰克图的贸易地位随之下降,张家口与恰克图的贸易关系也随之不断下降。

3. 多伦诺尔

多伦诺尔为清代口北三厅之一,地理位置背靠内外蒙古草原,地接新开垦农业区,贸易范围极广,从内蒙古的各盟旗尤其是从锡林郭勒、昭乌达、哲里木各盟旗到库伦,并延伸至恰克图等地。清嘉道年间,多伦诺尔贸易最盛,有商号3000余家,已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商业城市^[58]。经济腹地主要包括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及库伦以东的喀尔喀蒙古地区。

张家口与多伦诺尔商贸联系密切。多伦诺尔为张家口去往东北方向的商路节点,是张家口有力的经济外延地。清乾隆年间,已有张家口商人前往贸易。“今多伦诺尔游牧之区,地处偏僻,不过附近之张家口零星小贩,装载茶布等物前往货卖,以是惟万全县民人在该处者独多。”^{[13](P129)}多伦诺尔贸易的主要商品也多由张家口转运买卖。清末民初,多伦诺尔每年由张家口输入的砖茶就达约20万斤,经张家口输出的畜产品:牛约1万头,马约1.5万头,羊约20万头,羊毛约250万斤^{[59](P288-289)}。天津、营口、大连等沿海港口开埠后,内蒙古东部一带货物可以经营口、大连港口运出^[60]。特别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修通以后,内蒙古东部货物多由铁路运出,多伦诺尔在内蒙古东部集散市场地位不断下降。“自关内外铁路与俄人相接,一切货物全归东省。此为商业败坏之原因。”^[58]

(三)基层市场

张家口的草原腹地基层市场主要以小城镇、寺庙、王府为中心形成的商业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八旗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和以库伦为中心的漠北蒙古等地区。其商品流动多为旅蒙商以行庄和坐庄两种“出拨子”的形式贸易。

1. 基层城镇市场

基层城镇市场主要位于蒙古地区各盟旗衙署、王府和规模较大的寺院以及汉族移民较多地区设立的厅、县衙署所在地。这些城镇规模虽小,但为各自影响地域范围内,旅蒙商与蒙民贸易的主要地点^{[61](P235)}。因而,基层城镇也是小规模旅蒙商人在草原腹地内的聚集地。此外,位于商路沿线的台站等交通要点,如张库大道上滂江、乌德、叨林等也是基层市场重要的集散点。

张家口、库伦等地的旅蒙商多以坐庄的形式,将店铺设在各基层城镇市场。旅蒙商在这些地方一般建有固定的房屋,在西乌珠穆王府等不允许建造房屋的地方,旅蒙商则在附近建造蒙古包开展贸易^[60]。在城镇市场中规模较大的坐庄,常派出小规模拨子赴附近蒙地各处与蒙地牧民直接贸易,并在蒙地形成了密集的行商网^[60]。这样一来,基层城镇就发展成为上层市场旅蒙商的重要据点。如民国时期,据日本学者调查,张家口旅蒙商店铺设在临近内蒙古城镇的坐庄达数百家。其中,西苏尼特旗各地有67店,东苏尼特旗总计53店,东阿巴哈纳尔有22店,东西阿巴嘎旗有17店,东西浩济特旗有6店,东西乌珠穆沁旗有24店,察哈尔旗中正白、镶白、镶黄以下的各旗有29店,乌兰察布盟四子王府有1店^{[61](P246-247)}。

2. 基层农牧市场

基层农牧市场广泛分布于草原腹地农、牧区内的集市、庙会和农牧民聚居、游牧点。旅蒙商多以行庄的形式,每年在固定时间带上农牧民所需要的砖茶、砂糖、棉布、褥子、绸缎、皮靴、马鞍、鞭等日用商品去集市、蒙民的蒙古包和喇嘛庙附近,通过以物易物,换取蒙古牧民生产的畜产品,如毛皮、兽毛、牲畜等,然后再将这些商品运送到城镇市场及大的集散市场销售。清末,延清在《奉使车臣汗记程诗》中对张家口行商在布楞的交易情形有具体描述:“为觅蝇

头利,奔驰路几千。求沽藏犊玉,赚取守囊钱。驼橐凭携带,牛车佐贸迁。日中为市处,远亦到胡天。不须询物价,无复有便宜。利或逾三倍,偿非责一时。”^{[5](P426-427)}诗中记述了在基层市场交易形式除以物换物外,还可采用借贷方式,“偿非责一时”则说明了这一点。“张家口商人,多用骆驼载物,游行蒙古内地。此种行商,乃全与蒙人以货物交换者。交换方法,一当场授受,一刻期交物。”^{[27](P5)}

在基层市场,由于蒙民对张家口旅蒙商手中商品有依赖性,往往兑换交易是不对等的。这样,蒙民与旅蒙商之间往往容易形成借贷形式的债权债务关系。据M.Sanjdorj的研究结果显示,清咸丰五年(1855年),仅土谢图汗部债务累积已达72.7万两^{[62](P50-58)}。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张家口是长城沿线典型的陆路港口型城市。其无论从区位条件、港口功能还是腹地市场的构建,均体现出港口型城市的主要特点。但在贸易方式、运输条件、腹地市场体系等方面则与近代海港城市存在较大差异,具有其独特的一面。因此,围绕张家口陆港发展模式的中心问题,笔者拟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张家口陆路港口的形成得益于优越的区位条件。清代,张家口是出入蒙古草原的重要门户,是内地与蒙古草原货物转运枢纽,也是内地大宗商品输入及草原物产输出的重要通道。张家口在此基础上,依靠长距离陆路运输与蒙地构建了运输贸易网络和草原腹地市场。这也是张家口同其他陆路交通枢纽相比所具有的“港口”条件优势。如清代归化也是蒙古草原重要陆路枢纽,但近代西北皮毛贸易兴起后,包头依靠便利的区位条件取代归化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63]。

其次,张家口的港口功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在体现。从对张家口城市功能的考察可以发现,城市各功能之间形成了完整的港口功能体系。张家口中转交易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城市仓储、金融、运输等行业的发展,进而提升了张家口在内地与草原市场之间的转口贸易中心地位,并体现出陆港型城市的主要特点。以往相关学者对清代张家口研究多从商业、交通、金融等各要素去展开考察,而忽略了张

家口城市港口功能的整体性。

再者,张家口存在着“港口—腹地”模式下的草原等级腹地市场。从陆路港口角度切入,将“港口—腹地”模式运用到张家口市场体系上,无疑会对这一模式的内涵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就与腹地市场贸易的依存度而言,张家口的核心腹地市场主要位于旅蒙商集中活动的蒙古中东部地区。在市场等级划分上,主要按货物的集散程度,将腹地市场分为以库伦、恰克图、多伦诺尔为中心的二级集散市场,以及以城镇市场和农牧市场为贸易网点的基层市场。

此外,传统陆港与其他港口相比的劣势主要体现在运输工具和成本上。张家口以骆驼、牛车为主的传统陆路方式,相对于近代航运与铁路而言,价格高、效率低。这就决定了其腹地的大小和发展水平,难以实现具有伸长纵深的广阔腹地。一旦近代新式交通工具在腹地内推广和普及,其港口功能优势将不复存在。

注释:

①主要成果参见牛国桢、梁学诚《张库商道与旅蒙商述略》(《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的张家口茶叶集散市场》(《茶叶通报》2011年第2期),何一民、付娟《从军城到商城:清代边境军事城市功能的转变——以腾冲、张家口为例》(《史学集刊》2014年第6期),等等。

②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松弟《通商口岸与近代的城市和区域发展——从港口—腹地的角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徐蕴《近代长江上游港口与腹地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以宜昌、重庆、万县为中心(1877-1936)》(《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9期),等等。

参考文献:

[1]董晓菲.大连港——东北腹地系统空间作用及联动发展机理研究[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J].东方杂志,1927(9).

[3]忒莫勒,乌云格日勒.北部边疆·口北三厅志[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

[4]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

[5]毕奥南.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册[Z].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6]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台北:“中央图书馆”,1981.

[7]孔廷璋.中华地理全志:卷1[M].上海:中华书局,1918.

[8]向燕南.中国长城志:文献下[Z].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9]吴弘明.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0]张勇年.调查长城各口商务状况报告书[M].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4.

[1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杨志洵.蒙古与张家口之关系[J].商务官报,1908(12).

[13]高兆夔.张家口之货物贸易[J].金城,1926(2).

[14]吴松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变迁中的“港口—腹地”问题阐释[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15]内蒙古公路交通史志编委会.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16]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吴松弟.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J].河北学刊,2004(3).

[18]杨子斌.察绥旅蒙贸易业考察记[J].财政评论,1947(1).

[19]庄维民.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腹地市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1).

[20]姚继荣.清代历史笔记论丛[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21]Harry Parkes, "Report on the Russian Caravan Trade with Chin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24(1854).

[22]Muping Bao, "Trade Centers(Maimaicheng) in Mongolia, and Their Function in Sino-Russian Trade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 2006(2).

[23]渠绍森,庞义才.山西外贸志[M].太原:山西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4.

[24]樊如森. 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1).

[25]姚明辉. 蒙古志: 卷3[M]. 上海: 中国图书公司, 1907.

[26]实业: 蒙古铁道[A]. 国民日报汇编: 第3集[Z]. 上海: 东大陆图书译印局, 1904.

[27]姚祝萱. 新游记汇刊续编: 第5册[M]. 上海: 中华书局, 1923.

[28]阿·马·波兹德涅耶夫. 蒙古及蒙古人: 第1卷[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29]论张家口商务[N]. 申报(上海版), 1908-03-10.

[30]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张家口文史资料: 第13辑[Z]. 张家口: 张家口日报社, 1988.

[31]阿·马·波兹德涅耶夫. 蒙古及蒙古人: 第2卷[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32]郭蕴深. 中俄茶叶贸易史[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33]王泰谔. 调查: 蒙古调查记[J]. 东方杂志, 1908(7).

[34]叶·科瓦列夫斯基. 窥视紫禁城[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35]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J]. 中外经济周刊, 1925(124).

[36]米镇波. 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37]许檀. 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J]. 北方论丛, 1998(5).

[38]刘选民. 中俄早期贸易考[J]. 燕京学报, 1939(25).

[39]黄鉴晖, 等. 山西票号史料[Z].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40]蒋学楷. 山西省之金融业[J]. 银行周报, 1936(21).

[41]路联逢. 万全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第15册[Z].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42]阿·科尔萨克. 俄中商贸关系史述[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3]孙钺. 实用养羊全书[M]. 上海: 中国农业书局, 1943.

[44]普尔热瓦尔斯基. 荒原的召唤[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45]吴松弟, 等. 港口—腹地与北方的经济变迁(1840-1949)[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46]许檀. 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1).

[47]陈增敏. 宣化盆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48]伪张家口铁路总局总务处资业科. 张家口(市街地ノ發展)[M]. 伪张家口铁路总局总务处资业科, 出版年不祥.

[49]姚明辉. 蒙古志: 卷2[M]. 上海: 中国图书公司, 1907.

[50]克拉米息夫. 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51]傅安华. 俄蒙贸易与张库通商[J]. 新亚细亚, 1934(5).

[52]宋哲元, 梁建章. 察哈尔通志[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53]张家口调查录(采录)[J]. 地学杂志, 1912(6).

[54]李廷玉. 游蒙日记[M]. 民国4年(1915年)铅印本.

[55]潘景昌. 张库通商与开发西北[J]. 西北月刊, 1925(3).

[56]黄鉴晖. 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57]米镇波. 清代西北边境地区中俄贸易: 从道光朝到宣统朝[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58]刘钟葵. 多伦诺尔厅调查记[J]. 东方杂志, 1914(11).

[59]任月海. 多伦文史资料: 第1-4辑合编[Z].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7.

[60]江铎. 边疆研究: 对蒙古贸易市场及贸易机关之检讨[J]. 边事研究, 1936(6).

[61]后藤十三雄. 蒙古の遊牧社会[M]. 生活社, 1942.

[62]M. Sanjidorj, Translated from the Mongolian and annotated by Urgunge Onon: pref. by Owen Latimore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St. Martin's Press, 1980.

[63]胡铁球. 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J]. 近代史研究, 2007(3).